

南昌起义前经历了哪些波折

九十四年前爆发的南昌起义,因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革命之路,它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标志。南昌起义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早已彪炳史册,但起义的真实背景与一波三折的过程却少有人知。我们不妨追寻历史的足迹,探寻当年南昌起义背后的曲折与艰辛,铭记革命先辈们的坚韧斗志。

1927年春,蒋介石策划了“四一二”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展开大肆屠杀,致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陷入腥风血雨之中。面对国共合作彻底崩盘的被动局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出新的选择。

7月12日,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召开了改组会议,由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

面对白色恐怖,中央机关转入地下工作,并撤到上海。李立三、邓中夏则是按照中央分工,到九江部署中央机关转移事宜,顺便考察是否可以利用粤系军阀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返回广州重建阵营。

7月20日,到达九江的李立三等人敏锐地发现了张发奎要背叛共产党的迹象,立刻召开了第一次

九江会议。与会的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一致认为张发奎靠不住,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运用我党能够控制的军队,在南昌举行暴动。之所以把南昌选做暴动的地点,其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时在南昌的反动势力只有两个团,比较容易解决。而此时我党所能控制的部队,已移动至九江一带,再到南昌相对容易。会后,李立三向正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做了通报。瞿秋白非常支持,立刻前往武汉向中央汇报。

7月24日,在等候中央的答复时,面对张发奎“分共”步伐的加快,李立三与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召开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通知叶挺、贺龙,把我党所能控制的部队向南昌集中。

同一天,在接到瞿秋白传来的有关南昌暴动计划后,张国焘、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后,一致同意发动武装暴动,但要求把起义地点改到南浔。周恩来带着中央的指示于7月25日来到九江,召开了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李立三坚决反对把起义地点改在南浔。鉴于客观形势,周恩来同意了李立三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地点依然



放在南昌,同时安排邓中夏前往武汉向中央做进一步的汇报。

7月26日,就在邓中夏返回武汉汇报计划的同时,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拍发了电报指示: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

当天下午4点,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南昌起义事宜。与会人员有: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慈、俄国顾问加伦。

面对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指示,与会人员谁也不敢保证起义成功,何况共产国际的人都不得参加暴动,而且罗明那慈明确表示共产国际不为这次行动提供任何经济援助,这事实上否定了南昌起义的计划。共产国际之所以持如此态度,源于他们根本不了解目前的形势变化,依旧对国民党“左派”人物张发奎抱有幻想。

尽管瞿秋白、张太雷等人持有不同意见,但面对共产国际的权威,与会人员还是被迫接受,做出了3条决议:

1、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此应推迟起义时间;2、加伦将军的建议是可行的,应由周恩来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共同商量军队转移广东东江事宜;3、

派张国焘马上赶往南昌宣布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这次会议的决定。(黄一兵、武国友著《红流纪事·武装暴动第一枪·南昌起义》)

7月30日晨,张国焘抵达南昌后,立刻与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开会商讨。面对张国焘带来的指示,李立三、谭平山反应激烈,对着张国焘猛烈抨击,周恩来更是一改儒将风范,怒气冲冲地拍桌子吼道: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尽管多数支持按原计划起义,但由于排在中央五大常委首位的张国焘的反对,致使会议陷入僵局。休会期间,李立三等向张国焘详细地分析了起义势在必行的形势,介绍了张发奎的“分共”动作以及叶、贺部队均已抵达南昌等客观现状,张国焘最终同意了武装暴动计划。在会议上还确定了起义时间:8月1日凌晨4点。

然而,一个突发的意外事件,致使起义提前打响。

7月31日晚上,按照“前敌委员会”(7月27日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后来张国焘与谭平山也加入进来)的指示,朱德特意宴请朱培德手下驻守南昌的两个团的团长、副团长,

目的是为起义提供策应。

晚上9点来钟,一名军官突然破门而入,向敌军官报告说:刚才接到命令,今天晚上部队要举行暴动。这一消息,使在场的人都十分震惊。朱德首先反应过来,打着哈哈试图挽留,但敌军的军官们还是有所顾忌,各自带上自己的物品告辞。

客人前脚一走,朱德马上赶到二十军指挥部,将叛徒告密之事告诉贺龙。贺龙立即向前敌委员会报告,前委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南昌起义正式打响。紧接着,天主堂、大校场等各处枪声四起,起义军向着各个指定目标发起进攻,整个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拂晓时分,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整个南昌城,枪声渐熄,起义获得了成功。

当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要部队有: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24师;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10师;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及公安局的保安大队,起义部队总计约21000人(含随后赶到的第25师)。8月1日下午,聂荣臻、周士第策反的第四军第25师,也从回马岭赶到了南昌,汇入起义部队。

(据《北京晚报》)

2100多年前中国人已用北斗“导航”

文/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谭 畅

◎国宝档案——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今是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而三幅出土于西汉马王堆三号墓的古代地图显示,中国人运用北斗恒星“导航”的历史,超过2100年。

长沙城中的湖南省博物馆,珍藏着1973年从西汉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的三幅地图——《驻军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城邑图》。

据考证,西汉高后末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向长沙国南部发起进攻,朝廷及长沙国随即派兵征剿,《驻军图》等可能是此次征战使用的军事地图。

《驻军图》《长沙国南

部地形图》《城邑图》绘在丝帛之上,十分精美,其制作年代距今已有2100多年。三幅地图一个突出的特征,在于准确区分方向——图所示的方位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学界普遍认为,三幅地图是世界地图学史上罕见的瑰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古人是怎么“找着北”的?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古人绘制地图,区分南北主要利用日光和“北斗”。由于地球自转轴向两侧无限延伸,其中一侧的延长线会从位于北斗七星“勺子柄”端位置的北极星附近经过。四季轮回、斗转星移,古人运用肉眼或专用测量工具“望筒”等,很早就注意到“北极星位置基

本不变”这一现象,并将其运用于方位分辨和地图绘制。

汉代甚至汉以前的华夏先民,已经有能力比较准确地测量地理信息。先秦时期,古人运用“北斗”等星象与地理信息的对应关系判断方位;到了汉代,人们对于“北斗导航”的认识已经更加全面,例如在《淮南子》中,就记载有“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的说法。这说明在古人日常生活中,依靠“北斗”判断方向已经成为通识。

古人对“北斗导航”这类天文现象的观察、运用,以及规(测定单位距离,并画圆画弧)、矩(测定直角)、准(水准仪,测水平面)、绳(铅垂线,测定垂

直)、记里鼓车等工具的发明确和使用,使得中国古代绘制的很多地图已经有了比较高的准确性。

长53厘米、宽52厘米的《城邑图》,图上绘有城墙,用蓝色画出城门上的亭阁,红色表示街坊和庭院,按正方形画出街道等;长100厘米、宽78厘米的《驻军图》采用红、黑、青三色绘画,图中所绘主区位于今湖南南部宁远九嶷山与南岭之间,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所绘主区,为汉初长沙国南部8县(道),即今湖南南部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附近地区。

研究显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虽未标明比例尺,但经测算,其主区比例尺约为1:180000,相当于汉代的一寸折十里;图上所绘河流骨架、流向及主要弯曲等,均和现在地图大体相似,所绘山脉和山体轮廓、范围及走向也大体正确;这幅地图东半部分的方位角误差,仅为3%左右。在托勒密探索出球面投影和普通圆锥投影之前,这是人类古代文明中地图精确测绘的一个突出成就。

西汉基于“北斗导航”等观测和计算的地图制作技术,在后世不断发展。到了西晋,出现了成熟的地图理论与测绘方法。地理学家裴秀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

了名为“制图六体”的地图测量要素,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以及迂直(河流道路的曲折),跟现代地图要素已非常接近。

与“制图六体”同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名为“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绘图时,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相当于现代地形图上的方里网格。然后按方格绘制地图内容,以保证一定的准确性……

回望历史长河,在光辉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融合先民智慧独立发展出的地图测绘技术,离不开熠熠生辉、指引方向的北斗“导航”。